

梁启超与日本

石云艳 / 著

南开日本研究丛书

NANKAIRIBEN
YANJIUCONGSHU

●
天津人民出版社
TJRMCBS



南开日本研究丛书

梁启超与日本

石云艳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梁启超与日本/石云艳著.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6

(南开日本研究丛书)

ISBN 7-201-04905-4

I. 梁… II. 石… III. 梁启超(1873~1929)—
人物研究 IV. B25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0175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7117107

网址:<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tjrmchbs@public.tpt.tj.cn

南开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8 印张 1 插页

字数:400 千字 印数:1~2,000

定价:30.00 元

《南开日本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 编：杨栋梁

编辑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中田	王振锁	刘玉操	刘雨珍
米庆余	李 卓	谷 云	武安隆
宋志勇	赵德宇	薛敬孝	

《南开日本研究丛书》总序

世界已被称为“地球村”，各国、各民族的相互理解已成急务。日本为近邻，中日两国的交往不惟源远流长，且日渐密切。因而，研究日本、理解日本，更显重要。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南开大学即已建立专门机构，开展日本研究。进入 80 年代，研究人员渐多，研究成果颇丰。1988 年，又成立了综合研究日本历史、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哲学、语言、文学的学术机关——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推动学术研究、培养人才、多出成果，为提高我国日本研究的水平略尽绵薄，是其宗旨。公刊《南开日本研究丛书》，即为实现此宗旨。

《南开日本研究丛书》刊行本研究中心成员的研究成果，以专著为主，亦包括少量日本研究名著的译作。遴选纳入丛书的著译，力求资料翔实、方法科学、立论新颖、具有开拓性。

《南开日本研究丛书》由本中心主管刊行，并委托几位成员负责编务。纳入丛书作品的体例、观点等，皆由作者文责自负。

《南开日本研究丛书》的刊行，幸获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资助，在此顺致谢忱。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2004 年 9 月

引 言

梁启超^①，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年十六，入学海棠为正科生。十九入万木草堂。甲午以后，加入国事运动。年二十四，创《时务报》于上海。翌年冬，主讲长沙时务学堂。年二十六，值戊戌政变，走日本。又二年，自檀香山赴唐才常汉口之役，抵沪而事败，避地澳洲，旋适日本。四十岁，始归国，参与民国新政。洪宪及复辟两役，奔走反抗甚力。欧战起，主张加入协约国。年四十六，漫游欧洲。翌年东归，萃精力于讲学著述。卒于民国十八年己巳，溯生于同治十二年癸酉，得年五十六。^②

梁启超虽然仅仅度过56个春秋，但在以改良主义为特征的戊戌变法运动中，作为康有为的得意门生，以其鲜明的政治立场，卓越的文字才能，宣传维新改良、变法图强，在整个维新变法运动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被囚禁，维新派人士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和屠杀，梁启超在日本政府的帮助下流亡日本。

流亡日本之前，梁启超对日本的情况就比较熟悉。他关于日

① 1873年出生于广东新会县，1929年病故于北京。

② 梁启勋：《梁启超小传》，《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36年1月版。

本的知识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其一是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记》,该书是万木草堂《万国政治沿革得失》课目的主要内容^①。梁启超对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获得成功并很快变为世界强国十分景仰,说:“西方全盛之国,莫美国若,东方新兴之国,莫日本若。”^②。主张“近师日本,以考其通变之所由,远摭欧墨,以得其立法之所自”^③。其二是《日本书目志》中大量的翻译书籍。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于1898年由上海大同译书局出版。这本书中收集了1887年前后日本书籍七千一百多册,将其划分为政、法、农、工、商、教育、文学、理学、宗教等十五个门类。梁启超专门写了《读日本书目志书后》一文发表在《时务报》上,介绍康有为的这本书并宣传通过日本译书学习西洋。可见,《日本书目志》及其所收入的书籍对梁启超的影响是很大的。此外,从梁启超所汇编的《西学书目表》和《西学书目表序例》、《西学书目表后序》等文章中,也可以轻易地找到梁启超读书生活的轨迹和他对日本了解的途径。其三是同时代学者和友人对日本的介绍。当时出版且影响较大的有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顾厚锬的《日本政变考》,姚文栋的《日本志》,姚文林的《日本地理兵要》等。其中,黄遵宪及其《日本国志》对梁启超的影响最大。他在《日本国志后序》中说:“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黄子公度撰日本国志,梁启超读之,欣怿咏叹黄子,乃今知日本,乃今日本所以强,赖黄子也。又懣愤责黄子曰:乃今知中国,知中国所以弱,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今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④对黄遵宪的书赞

① 陈华新:《康有为与〈日本变政考〉的几个问题》,《论戊戌维新运动及康有为梁启超》,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4页。

② 《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43页。

③ 《农会报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30-131页。

④ 《日本国志后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50页。

赏备至,并将中国之所以致弱,归因于黄遵宪的书出得太晚,以至于使中国人不了解日本,没有可以借鉴的榜样,没有忧患意识,落到了国政衰弱、割地赔款的地步。

梁启超基于自己对日本的了解,极力提倡中国通过日本学习西方。在《读〈日本书目志〉书后》中他大声疾呼:“日本之步武泰西至速也。故自维新至今三十年,而活艺已成。大地之中,变法而骤强者,惟俄与日也,俄远而活效不著,文字不同也。吾今取之至近之日本,察其变法之条理先后,则吾之活效,可三年而成,尤为捷疾也。”^①梁启超认为,在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的情势下,欲自救就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制度和文化。学习西方而得以变法自强的国家有俄国和日本,在国人很少通西文和俄文的情况下,取道日本学习西方是最近的捷径。他说:“中国日本,同立国于震旦,画境而治,各成大一统之势,盖为永静之国者,千年于兹矣。日本自劫盟事起,一二侠者,激于国耻,倡大义以号召天下,机揅一动,万弩齐鸣,转圜之间,遂有今日。后之论者,悼诸君所志之示成,而不知其所成盖亦多矣。我国自广州之役,而天津,而越南,而马关,一耻再耻,一殆再殆,而积薪厝火,鼯声彻外,万牛回首,丘山不移。呜呼,岂外加之力犹未大也,抑内体之所以受力者,有不任也……抚王室之蠢蠢,念天地之悠悠,乃掩卷而长太息也!”^②

将中国和日本进行比较,虽同立于世界,同属于东方大一统的静态落后社会,但日本却由于幕末志士振臂高呼、各地英雄纷纷响应使维新强国大业获得了成功。而中国却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起,一败再败,直至甲午战争,虽屡屡割地赔款,却仍然鼾睡如初,不知自醒。梁启超认为这不是外界的压力不够,而是其社会内部缺乏

① 《读〈日本书目志〉书后》,《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53页。

② 《记东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31页。

自新图强的动力。对比之后,使梁启超不尽掩卷长叹。

当时梁启超所认识的日本,虽然只是区区三岛,但“西方之雄者,若俄、若英、若法、若德、若美,咸屏息重足,莫敢藐视”^①。经过明治维新,日本已经从“古之弹丸”,一跃而为“今之雄国”,“三十年间以祸为福,以弱为强,一举而夺琉球,再举而割台湾。此士学子鼾睡未起,睹此异状,桥口咋舌,莫知其由。故吾政府宿昔靡得而戒焉。以吾所读日本国志,其于日本之政事人民土地及维新变法之由,若入其闺闼而数米盐,别白黑而诵昭穆也”^②。

梁启超没有停止于掩卷长叹,他的结论是,中国必须效法日本:“变亦变,不变亦变,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③最快的“变”法就是以日本为鉴,号召中国人读日本书,他大声疾呼:“愿我君后,读明治维新之书,借观于寇雠,而悚励其新政,以保我二万万里之疆土,纳任昧于太庙,以广鲁于天下。”^④

学习日本,走维新变法自救图强之路,可以说是梁启超流亡日本之前的社会理想。

流亡日本以后,梁启超的政治和学术生涯与日本就更加密不可分。从1898年梁启超26岁在天津大沽口登上日本的军舰,到1912年40岁回国,在日本度过了十四年的流亡生活。这十四年的流亡生活在梁启超三十余年的政治学术生涯中占据了近一半的时间,梁启超的重要著述也大多是在流亡日本期间完成的。梁启

① 《记东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29页。

② 《日本国志后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50页。

③ 《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8页。

④ 《读〈日本书目志〉书后》,《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54-55页。

超通过日文书籍研读了大量的西方著作,目睹了从西方嫁接过来的日本式的民主制度,接触了一大批日本政界人物和学者,这些对其政治主张和思想学术等无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流亡期间,梁启超全力投身于学习和介绍西方的先进思想文化,通过日本输入近代西方文明进而重建中国文明,被人们认为是当时文明的“掌舵人”,是舆论界“执牛耳”的启蒙思想家和革命家,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流亡期间,梁启超通过《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报刊杂志鼓动提高“民智”,确立“国民意识”;通过创办横滨大同学校、神户同文学校、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来培植人才,推进维新事业等。此外,他倡导了“史学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撰写文章,组织团体,广泛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和社会学说,猛烈抨击清朝的腐败政治。流亡期间,梁启超曾游历澳大利亚、美国等地,扩大保皇派的势力与影响;也曾一度倾向革命、主张破坏,尝试与孙文进行合作;立宪运动中他力主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对辛亥革命的爆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梁启超学识渊博,著作等身,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32年)所收录的文章就有约九百二十万字,其著述约在一千四百万字内外。^①从其著述的目录中不难看出,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活跃、最有影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之一,在西方思想文化传播中的历史地位是不可磨灭的。在近代中国的文明转型时期,梁启超所发挥的作用,不仅超过了其老师康有为,也超过了与他同时代的任何人。

^① 李国俊著:《梁启超著述系年》,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台湾学者张朋园说,梁启超“一生的言论著述,据最保守的估计,不下于一千四百万字”。《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绪论》第3页。

国内外研究梁启超的研究者众多,研究的成果也洋洋大观。但是,学界对梁启超流亡日本的历史以及这 14 年对梁启超的思想和政治影响研究得还不充分。近年来,有些学者开始将研究的视野转向梁启超和日本的关系上面,比如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的狭间直树教授等,一直把明治日本对梁启超的影响作为其研究的重点。但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他从事了哪些社会活动?他著述、翻译和介绍了哪些思想理论,日本的政治家、思想家对梁启超产生了什么影响以及梁启超的思想和政治立场等方面发生了哪些变化等等,还有必要挖掘更多的历史资料加以研究和考证。

在南开大学、日本国学院大学和京都大学众多师友的帮助下,我有机会到日本当年梁启超活动过的地方调查和搜集资料,对梁启超流亡日本 14 年的活动踪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本书是在这个基础上完成的。本书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梁启超与日本的关系为线索,通过新发现的历史研究资料,力求弄清楚梁启超流亡期间的历史踪迹和政治立场、思想理论发展变化的过程,以彰显梁启超在近代中国思想启蒙中的历史作用。

本书除引言和结语部分以外共分十章。

第一章利用日本外交史料馆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 支那部革命党关系(包括亡命者)》卷中有关涉及梁启超的资料,考察梁启超逃亡日本使馆的经过和流亡初期企图请求日本政府出面救助光绪皇帝和其他维新派志士的政治活动,阐明日本政府对梁启超流亡的立场和态度,以及对梁启超流亡初期所提供的援助等。

第二章研究了梁启超学习日语和编写《和文汉读法》的史实,并通过《和文汉读法》的得失,考察梁启超对日语及其学习日语的认识。

第三章透过《东籍月旦》看梁启超流亡时期的读书生活。研究了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读书、翻译和介绍西方思想学说的情况,

介绍了梁启超利用日本借助汉字创造的“日语词汇”,传播新思想和促进汉语词汇的变革和发展,同时论述了梁启超对翻译工作的独特经验和认识。笔者通过对其部分著作内容及其发表时间等进行考证,发现部分传记基本上是梁启超从日本人写的书籍或当时日本报刊上翻译并经过自己的加工而成的。虽然这一研究花费了较多的时间,但对研究梁启超思想体系的形成却至关重要。

1906年梁启超抄录并出版的《松阴文钞》,是研究梁启超和吉田松阴思想共鸣的宝贵材料,在第四章中首次利用这一资料从政治、国家观念和教育、伦理等方面对梁启超和吉田松阴进行了对比分析,考察了梁启超与吉田松阴的思想共鸣,以图理清明治以前日本革命家、思想家对梁启超的影响。

第五章利用从京都大学获得的一系列原始文献和狭间直树先生主编的《梁启超 明治日本 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对梁启超思想理论来源,特别是与日本思想家之间的渊源关系,对流亡滞在日本在梁启超思想形成中的影响作用进行了系统的考察。笔者认为这是研究梁启超思想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变化的新视角,其中的许多资料在国内是第一次使用。福泽谕吉的“文明开化论”对梁启超的启发和借鉴在《自由书》、《国民十大元气论》等著作中都可以找到印记,日本德富苏峰在文学上对梁启超也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梁启超思想理论和学说体系的形成,与这些人的思想影响是密不可分的。

办报、办学是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的主要活动内容。本书的第六章考察了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期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报》的情况,并透过其对报刊宗旨、原则和对报刊功能的认识,分析了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第七章考察了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在日本友人和爱国华侨的帮助下创办“横滨大同学校”、“神户同文学校”和“东京大同高等

学校”的情况,阐述了梁启超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第八章和第九章是考察梁启超在学习和借鉴中逐步形成自己思想体系的过程,并借鉴现有的研究成果,说明了日本对梁启超思想的形成和传播西方文化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其中首先通过分析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和梁启超的国家观,看梁启超从崇尚卢梭到信仰伯伦知理的思想转变过程;进而透过穆勒《自由论》的影响,看梁启超自由、人权思想的形成。最后是研究梁启超经济学思想的理论来源和其主要的经济学思想。

学界对梁启超政治立场转变的研究已经很多,本书第十章重点考察了流亡期间梁启超与康有为和孙中山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考察梁启超十四年流亡生活中两次大的思想和政治立场的转变;以保皇派与革命派的论战为线索,探讨了梁启超政治立场转变的社会政治和思想理论基础,并剖析了他提出《开明专制论》理论根源及其与革命党人论战的有关情况。

本书的结语部分,对梁启超流亡十四年的活动作了简单的历史评价。

梁启超一生对中国文化发展贡献至大。由于梁启超“务广而荒”,他的学术思想几乎涉及到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如在哲学、宗教、史学、法制、国际关系、文艺理论,考古学、图书馆学等方面,梁启超都有重要的建树。由于本书的研究重点是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的活动,所以对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的思想形成和理论建树,1912年回国后梁启超的政治活动、社会活动、文化学术活动和思想理论体系的发展,以及梁启超流亡日本前后思想和学术上的连续性问题,尚需将来另行研究。本书没有涉及或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也有很多,比如流亡日本期间,梁启超访问、游历了美洲、澳大利亚、欧洲等地,有一些研究资料值得挖掘,限于篇幅,本书尚未涉及;还有,由于原始研究资料的缺乏,对梁启

超在日本的社会交往情况,特别是他与柏原文太郎、平山周、犬养毅等人的交往,以及梁启超和维新党人士的交往,梁启超与冯镜如等爱国华侨的关系,梁启超和孙中山以外的革命党人的交往等等,也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梁启超流亡的十四年,正是中国发生巨变的十四年,是中国各种政治力量迅速出现并相互角逐和大清王朝走向寿终正寝的最后十四年。梁启超作为维新派的领袖,代表当时的一种主要政治力量。进一步深入研究梁启超社会政治活动的史实,探讨其思想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考察他在中国近代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发展中的历史地位,是学界的长期任务。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流亡初期的政治活动和日本政府的对应	(1)
第一节 梁启超流亡日本的经过	(2)
一 变法失败逃进日本公使馆	(2)
二 经天津乘日本军舰流亡日本	(7)
三 梁启超流亡日本的原因	(11)
第二节 梁启超流亡初期的政治活动	(13)
一 梁启超致书伊藤博文	(13)
二 梁启超致书大隈重信	(16)
三 与外务省参事官志贺重昂的笔谈	(20)
四 流亡初期的其他政治活动	(25)
第三节 日本政府对梁启超流亡的立场和生活安排	(30)
一 日本政府对梁启超流亡的立场和态度	(30)
二 通过民间的方式安排梁启超的流亡生活	(40)
第二章 梁启超与《和文汉读法》	(45)
第一节 学习日语的意义与《和文汉读法》的由来	(45)
一 对学习日语意义的认识	(45)
二 《和文汉读法》的由来	(50)
第二节 《和文汉读法》的内容	(55)
第三节 对《和文汉读法》的评价	(70)

第三章 《东籍月旦》和翻译介绍西方文化思想	(82)
第一节 《东籍月旦》与梁启超博览群书	(83)
一 《东籍月旦》的出版目的	(83)
二 《东籍月旦》的读书目录	(86)
三 梁启超博览群书	(90)
第二节 翻译介绍西方和日本的文化思想	(94)
一 学习西方自翻译开始	(94)
二 介绍西方文化思想中对日语词汇的借用	(98)
第三节 介绍西方思想 为西方政治人物立传	(104)
一 梁启超介绍西方著述的概况	(104)
二 宣传西方思想大家、播撒西方近代文明	(112)
三 梁启超为西方政治人物立传	(125)
第四章 梁启超与《松阴文钞》	(139)
第一节 梁启超出版《松阴文钞》	(139)
第二节 “尊王攘夷”、报国强国思想的共鸣	(143)
一 “尊王攘夷”思想的共鸣	(143)
二 崇尚松阴报国精神	(147)
三 效仿松阴主张开国、强国	(153)
第三节 梁启超与吉田松阴的办学育人之道	(155)
一 梁启超与吉田松阴一样重视教育	(155)
二 志在培养文武兼备、爱国报国人才	(158)
三 在教育目标和教学方法上的思想共鸣	(162)
第四节 以“忠、孝”为本的儒家思想	(165)
第五章 梁启超与明治思想家	(169)
第一节 福泽谕吉“文明论”对梁启超的影响	(170)
一 福泽谕吉及其《文明论之概略》	(170)
二 《文明论之概略》对梁启超的影响	(177)

第二节 梁启超与德富苏峰的文学思想	(192)
一 德富苏峰和梁启超的相似之处	(192)
二 德富苏峰“新文体”对梁启超的影响	(195)
三 德富苏峰在小说观念方面对梁启超的影响 ...	(200)
第六章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及其新闻思想	(207)
第一节 梁启超流亡期间办报的基本情况	(208)
一 《清议报》的创刊和发行	(208)
二 《新民丛报》的发行	(212)
三 《新小说》栏目及《新中国未来记》	(218)
第二节 梁启超办报与时政的关系	(225)
一 办报是梁启超继续维新的政治行动	(225)
二 把报纸作为宣传、鼓动新思想的阵地	(228)
三 把办报作为维新派的旗帜,公开称之为“党报”	(231)
第三节 梁启超办报的宗旨、原则和对报刊功能的认识	(233)
一 梁启超办报的宗旨	(233)
二 梁启超办报的原则	(236)
三 梁启超对报刊功能的认识	(239)
第七章 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期的办学活动及其教育思想	(244)
第一节 流亡日本时期的办学活动	(244)
一 梁启超与横滨大同学校	(244)
二 创办“神户同文学校”	(251)
三 创办“东京大同高等学校”	(253)
第二节 流亡日本时期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257)
一 提倡日本和西方的教育制度	(257)